

冷战初期顾维钧雇用诺曼·佩奇 在美进行媒体公关探析*

魏兵兵

内容提要 1949年7月,国民党当局驻美大使顾维钧雇用电台记者诺曼·佩奇(Norman Paige)对美国媒体界展开公关活动,其背后有使馆秘书顾毓瑞的积极推动。而促使顾维钧最终下定决心关键因素,是美国政府即将发表的《美中关系白皮书》,该白皮书将国民党的失败归因于自身内部问题,对国民党极为不利。受雇期间,佩奇周游美国各地,多方联络宣传,旨在博取媒体界对国民党的同情,改善台湾当局继续向美求援的舆论环境。顾维钧高度认可佩奇工作的价值、方式和成绩,一再力主续聘,直至1953年底台湾当局因调整对美宣传方略而终止聘约。佩奇的媒体公关活动助推了反共思想和冷战思维在美国社会的蔓延与强化,参与了冷战初期美国各界对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认知的形塑过程,对中美关系产生了十分深远的负面影响。

关键词 冷战初期 顾维钧 诺曼·佩奇 顾毓瑞 美国媒体

作者 魏兵兵,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副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国民党当局败退台湾前后,为争取美国政府的继续援助,曾在美国朝野开展多种形式的宣传活动,深刻影响了美国对华政策的演变。除了当时驻美及访美之国民党人的公开鼓吹和私下拉拢外,国民党当局也出资聘用美国“代理人”,为之进行游说和公关活动,其代表人物有二:一位是侧重联络美国政界尤其是国会议员的古德温(William J. Goodwin),另一位是以对美国媒体进行公关活动为主要工作的诺曼·佩奇。与受雇不足2年的古德温相比,为国民党当局效力约4年半之久的佩奇不仅活动时间更长,而且主要以大众媒体为工作对象,其活动的社会政治影响更加广泛而深远。^①值得注意的还有,佩奇是由时任“驻美大使”顾维钧决定雇用的唯一“宣传专员”,且颇受后者称许,因此佩奇的活动也从侧面反映出这一时期顾维钧的外宣思想。

* 本文系中国历史研究院侯中军工作室项目资助成果。

^① 古德温1948年3月被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驻美办事处聘为公共关系顾问,为期一年;1949年7月在宋美龄的安排下,受聘为国民党国际宣传处中华新闻社的公共关系顾问,1950年4月因故被提前解聘。佩奇于1949年7月获聘为中华新闻社的新闻顾问,此后迭经续聘,直至1953年底。参见金光耀《国民党在美国的游说活动——以顾维钧为中心的讨论》,《历史研究》2000年第4期。

关于1949年前后国民党当局在美国的宣传游说活动,学界不乏较为全面的研究,但对于雇用美国代理人进行的公关和游说活动,考察却相当有限,论及佩奇的著述更是稀少。这主要是因为此类活动通常在幕后运作,较为隐秘,存世且公开的相关资料非常有限。而且,不同于1949年就被美国报刊揭露其游说活动的古德温,佩奇的代理人身份长期不为外界所知,故学界相关著述对之鲜有提及。^① 笔者目力所及,仅金光耀利用哥伦比亚大学所藏《顾维钧文件》(Wellington Koo Papers)中相关档案等史料,论述了佩奇的雇佣经过、主要活动以及顾维钧对其工作的评价等。^② 此外,陈冠任和赖韦廷分别利用台北“国史馆”所藏相关档案,对佩奇的基本活动和解聘原因进行了简述。^③ 金文的研究具有开拓性,惟该文系对国民党于大陆失败前后在美游说活动的综合考察,其中仅有一节聚焦佩奇相关史事,考论势难系统周详。陈、赖二文中更是仅有一段十分概略的述论,并未展开和深入。现有研究关于顾维钧雇用佩奇和台湾当局终止聘约之原因的分析皆不无推进空间,对于佩奇长达4年多的媒体公关活动及其影响的考察也较为笼统概略,有待更细致的梳理和评析。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发掘《顾维钧文件》中的相关史料,结合其他文献,深入探究国民党当局雇用佩奇对美国媒体界开展公关活动的始末原委,以期完整、清晰地呈现冷战初期美国对华关系中一个鲜为人知的面相,并对顾维钧外交活动和思想之研究有所补益。

一、顾毓瑞的“大胆计划”

1949年7月,国民党当局在大陆的统治日薄西山之际,时任驻美大使顾维钧决定雇用美国电台记者诺曼·佩奇对美国媒体展开公关活动,以图推动媒体制造有利于国民党当局的舆论,进而影响美国对华政策,使之继续为风雨飘摇中的国民党政权提供援助。这并非国民党当局首次利用外国记者进行对外宣传工作,如抗战期间宣传机构就曾聘请一些外国记者在各国从事新闻宣传,以争取国际社会对中国抗战事业的同情和援助。^④ 但战后专门雇用一位外国代理人对美国媒体界进行大规模公关活动,佩奇似是首例。

顾维钧之所以有此“创举”,与国共战争局势和美国对华政策的变化密切相关,而时任驻美大使馆秘书兼新闻发布官顾毓瑞的积极推动也是重要因素。此事之萌端似可追溯至1948年12月驻美大使馆收到的一份备忘录,提交者是《亚特兰大宪政报》(Atlanta Constitution)及数份加州报刊驻华盛顿的通讯员威廉姆斯(Gladstone Williams)。这份题为《关于中国形势的备忘录》的文件,内容实则是有关民国政府对美宣传的若干建议。威廉姆斯认为:中国政府若能尽快实施一项全面的宣传计划,就可以在美国形成一种强大的公众意见,促使国会和政府将下一财年马歇尔计划中更多份额的资金用于与共产主义作战,意即加大力度援助国民党进行反共内战。备忘录就宣传计划向国民党当局提出了若干具体建议,包括推动成立一个由全美知名人士组成的委员会,向美国民众阐

^① 对于古德温游说活动的学术性考察,最早见于美国学者凯恩(Ross Y. Koen)1974年出版的《The China Lobby in American Politics》(Harper & Row Publishers, Inc., New York)一书,相关论述见中译本《美国政治中的“院外援华集团”》(张晓贝等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52—54页。资中筠《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和发展(1945—1950)》(重庆出版社1987年版)一书对1949年前后国民党在美国的游说活动作了较为全面的考论,但仅简略提及古德温(第336页)。两书都没有论及佩奇。

^② 金光耀:《国民党在美国的游说活动——以顾维钧为中心的讨论》,《历史研究》2000年第4期,第66—69页。

^③ 陈冠任认为佩奇的宣传工作“零星且缺乏系统”,“成效有限”且不易评估,故台湾当局最终予以解聘。赖韦廷则认为“外交部”虽然最终决定不再续聘,但对佩奇工作之“成效仍表肯定”。陈冠任:《1950年代国民党当局对美宣传策略的形成与转变》,沈志华、唐启华主编:《金门:内战与冷战:美、苏、中档案解密与研究》,九州出版社2010年版,第277—278页。赖韦廷:《“中华民国”对外文化冷战:以外交部对美宣传为中心,1949—1985》,硕士学位论文,台湾政治大学历史学系,2023年,第14—15页。

^④ 王晓岚:《论抗战时期国民党的对外新闻宣传策略》,《抗日战争研究》1998年第3期,第116—117页。

民国政府的困境和所需援助;说服美国电影界拍摄反共影片并在全美各地放映;请美国在华传教士回国向教徒讲述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的严重后果;将所有美籍华人组织起来,要求美国政府向国民党当局提供紧急援助;驻美大使馆启动对国会两党领袖的游说运动;在华盛顿设立一个小型机构负责指导实施宣传计划。^① 由于缺乏相关史料,威廉姆斯向使馆提出这份备忘录的缘由或动机不详。

驻美大使馆收到备忘录之时,解放战争已进入战略决战阶段,国民党政权渐露崩解之象,美国相应开始调整对华政策。1948年11月初,辽沈战役以国民党军队的溃败而结束,至12月中旬,淮海战役也胜负已定。美国在华外交官、军事代表和顾问几乎一致认为,国民党军事上的彻底失败已无可避免,除非美军直接参战,否则再给予多少援助也无济于事。杜鲁门政府的决策者们虽仍在犹豫观望,继续采取“有限援助”的政策,但已开始筹划如何从中国事务中“脱身”,以尽可能减少中国革命胜利对美国的不利影响。^② 在此形势下,国民党当局比以往更需要通过对美宣传活动避免被美国所抛弃,并争取美国更大力度的援助,以作最后之抵抗。

收到威廉姆斯的备忘录后,顾维钧命驻美大使馆主要负责对外宣传工作的顾毓瑞加以研究。后者于1949年1月7日向顾维钧提交报告,认为威氏的计划较全面,如有经费支持,可收良好效果。同时,他提议最好由美国援华联合会(United Service to China)^③在使馆的资助和支持下开展相关活动,并建议顾维钧说服时任美国国会“外援监督小组”成员、极力鼓吹给予国民党军事援助的“知名公民”蒲立德(William Bullitt)出面主持其事。^④

很可能正是受到威廉姆斯备忘录的启发,顾毓瑞在2月初向顾维钧提出了一项“大胆计划”:雇用一位“一流的公关顾问”对美国各界展开宣传工作。顾毓瑞称,由于中共坚持“严苛的条件”,和谈无望,国民党只能“作战到底”。他认为:

最近的调查表明,虽然美国国会诸领袖有意提供援助,但(国民党当局)仍需做大量工作才能促使此种意愿转化为实际行动。首要之务是必须教育(美国)民众,使他们对我们的事业坚信不疑,以预防反对援助的集团挑起任何针对美国进一步对华援助的争论。

……既然将来获得援助的前景并不似人们普遍相信的那般渺茫,则或可在公关领域采取更大胆的行动,以取得更大效果。^⑤

其实,当时民国政府资源委员会驻美办事处所聘公共关系顾问古德温在游说国会议员的同时,也做一些联系新闻媒体的工作。^⑥ 但在顾毓瑞看来,古德温不是第一流的公关专家,其活动渠道

^① Gladstone Williams, “Memo on the Chinese Situation,” December 15, 1948, 哥伦比亚大学珍本与手稿图书馆藏(下文藏所从略), *Wellington Koo Papers*, 0180-002-0184-002, 0180-002-0184-003, 0180-002-0184-004, 0180-002-0184-005。

^② 资中筠:《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和发展(1945—1950)》,第191—195页。

^③ 美国援华联合会原名美国援华救济联合会(United China Relief),由美国《时代》杂志创办人亨利·鲁斯(Henry R. Luce)于1941年2月推动成立,旨在统一美国各地援华募捐活动和统一提供援华经费,支持中国的抗战事业。1946年更名为美国援华联合会。

^④ “Ku to Koo,” January 7, 1949, *Wellington Koo Papers*, 0180-002-0184-001。蒲立德20世纪30年代曾先后任美国驻苏和驻法大使,1939年返美后虽未再出任公职,但仍以社会人士身份积极进行政治活动。蒲氏于1934年和1947年两度访问中国并获蒋介石接见,极力鼓吹美国援助国民党进行反共内战,并积极协助驻美大使馆游说国会议员,是当时所谓“院外援华集团”(China Lobby)的重要成员。参见资中筠《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和发展(1945—1950)》,第332页。

^⑤ “Ku to Koo,” February 3, 1949, *Wellington Koo Papers*, 0180-002-0016-001, 0180-002-0016-002。

^⑥ 如1948年11月,古德温曾致函196位美国报纸编辑,鼓吹援蒋反共。1949年2月,又致函国会议员和一些主要报纸的编辑,呼吁各方督促总统杜鲁门继续援助国民党当局。此外,古德温经常安排一些小型聚会讨论中国问题,除政界名流外,一些著名作家和媒体界人士也受邀参加。“The Employment of William J. Goodwin,” *Wellington Koo Papers*, 0158-Q21-0040-008, 0158-Q21-0040-009, 0158-Q21-0040-010。

“太有限”，“没有也无法影响报刊和电台”。为此，他向顾维钧建议雇用“一流的公共关系顾问”汉尼根(Steve Hannegan)。汉尼根是一位颇具影响力的民主党人，曾任美国邮政部长，后被可口可乐公司聘为公关顾问。该公司副总经理和泛美航空公司副总经理都向顾毓瑞推荐汉尼根，并谓其年薪约为5万美元。顾毓瑞认为汉尼根拥有足够的“声望和影响力，既能接触到国会议员，又能影响民众”，值得高薪聘请，建议顾维钧适时向政府建议实施“此一大胆计划”。^① 可能是因为时局关系或经费原因，此事没有下文。但顾毓瑞并未因此放弃其“大胆”想法，而是继续物色合适的人选，不久后他在纽约结识了电台记者佩奇，开始与之商谈合作事宜。

二、雇用佩奇之经过

诺曼·佩奇自称毕业于斯坦福大学新闻专业，早年主要在西雅图和南加州从事电台工作，积累了一定的新闻报道和宣传工作的经验。1937年开始在好莱坞担任一家电台的制作经理，期间还参演了数部电影，1939年任旧金山通用电气国家广播公司(General Electric—National Broadcasting Company)一家电台的经理。太平洋战争期间，佩奇先是在唐·李相互广播公司(Mutual Don Lee Broadcasting Company)从事新闻编辑工作，后赴远东，同时任美国对外广播情报处(FBIS)首席战地通讯员和美国广播公司(ABC)前线通讯员，1945年9月2日曾在美军密苏里号战列舰的甲板上直播盟军受降仪式。战后他继续担任美国广播公司远东通讯员的同时，在菲律宾创办了3家商业电台，1949年4月将在菲电台资产悉数出售，获利丰厚。在向顾毓瑞提供的背景自述中，佩奇还称自己断断续续地从事写作，向各类杂志和出版物供稿，长期以电台记者身份四处旅行，与所有新闻通讯社都建立了联系。^②

佩奇并非“第一流的公共顾问”，亦难称第一流的记者，但其在美国新闻媒体界丰富的工作经历和宽广的关系网络，引起了顾毓瑞的兴趣，而佩奇本人也愿意为国民党当局效力。5月，二人就合作事宜进行了反复沟通。顾毓瑞提出先以按劳计酬的形式开展一些工作，意在试用以观效果，但佩奇认为前期若能全职投入工作，效果会理想得多。^③

6月8日佩奇再次与顾毓瑞面谈，并应后者要求，于次日提交了一份题为《国民政府公关行动》的备忘录，说明其工作计划。佩奇称，此次公关行动的宗旨是尽可能广泛地利用报纸、广播、电影、论坛和教育机构等渠道，向美国民众宣传国民党当局的目标、意图和政策。为此，他计划首先前往纽约、芝加哥等8个媒体重镇，与当地报纸和电台的主管人员进行必要的初步协调，然后以纽约为活动总部，掀起一波宣传浪潮。备忘录中列举了7种计划开展的具体活动：一是在杜鲁门总统的赞助下，组织一个由政界、出版界和商界领袖组成的委员会研究中国问题，就美国应采取的对华政策向杜鲁门报告研究结论；二是通过报纸和广播媒体展开一场“恐惧宣传运动”，强调共产主义在中国扩张对美国的危险，以及援助国民党当局以阻止共产主义在远东扩张的必要；三是配合和协助政界推动成立反共的“太平洋公约”(Pacific Pact)；四是发起反对美国政府承认中国共产党政权的运动；五是根据使馆提供的材料，发表有关中共“暴行和虐待行为”的报道；六是持续推动媒体界人士发表有关共产主义对美“威胁”和援助国民党当局以推进美国全球“反共战争”的言论；七是开展对

^① “Ku to Koo,” February 3, 1949, *Wellington Koo Papers*, 0180-002-0016-002.

^② 1976年佩奇去世后，《华盛顿邮报》一则报道称其享年60岁，则他当生于1916年。但佩奇自称1928年就获得了斯坦福大学的学士学位。两则信息显然存在矛盾，故佩奇的出生年份待考。“Paige to Ku,” June 9, 1949, *Wellington Koo Papers*, 0180-002-0253-001-002. “Broadcast Japanese Surrender: Norman Paige,” *The Washington Post*, March 8, 1976, p. C4.

^③ “Ku to Koo,” May 25, 1949, *Wellington Koo Papers*, 0180-002-0179-001.

国民党领袖(尤其是在美国者)的个人宣传。

佩奇表示,上述活动主要是利用报纸和广播的宣传,此外他还可以利用在华盛顿的关系网络,为国民党当局提供游说美国立法和行政机构的服务。关于聘期和费用,佩奇称一项公关行动至少需要6个月时间才能取得实质成效,但雇用满3个月后,任何一方都可提前30天宣布中止。他要求每月至少获得2500美元的经费,其中2000美元为薪酬,500美元为各项开支。最后,佩奇敦促尽快启动计划,称自从5月上海解放后,美国公众对中国事务的兴趣正日益降低,而通过与报纸和电台的前期接触,他有信心使有关国民党当局的报道“回到头版”。^①

顾毓瑞认为佩奇的计划“值得考虑”,建议顾维钧试用佩奇两三个月。同时,他认为佩奇与报纸界和电台界最熟悉,其活动应集中于媒体领域,对政界的工作则是其次的。^②对此,顾维钧似亦赞同,这从他在佩奇备忘录上的批阅痕迹可见端倪:在备忘录所列7种具体活动中,顾维钧用红笔在主要与媒体相关的5种前面做了标记,而与政界高层牵涉较多的第1、3两种前面则没有。

尽管佩奇信心满满,顾毓瑞也主张试用一段时间,但可能是出于谨慎,顾维钧并未随即决定雇用。6月20日,驻美大使馆公使衔参赞陈之迈向顾维钧报告,称设法与佩奇的一位好友取得了联系。此人曾在菲律宾与佩奇共事,称后者拥有良好的写作能力,曾广泛游历远东地区,其在菲电台经营十分成功,是一位优秀的组织和管理者;并称佩奇在美国的电台和杂志界交游颇广,与重要电台管理者和杂志编辑们关系良好,其人总体上性情友善,易于相处。基于这些信息,陈之迈也建议顾维钧与佩奇见面,商讨后者提出的计划。^③

7月15日,顾维钧约见佩奇,双方交谈内容不得而知,但当面交流无疑使顾维钧对佩奇有了更多了解,双方就此确定了雇用关系。^④19日,国民党当局外交部长叶公超致电顾维钧,命其招雇可以胜任的中外人士,通过他们与美国最著名的一些专栏作家、电台评论员和特稿记者建立良好关系,并持续为之提供信息和建议。叶表示,将为此类工作批准临时预算。^⑤对顾维钧而言,这无疑是一封“恰逢其时”的电报。他26日复电称,使馆明白宣传工作的重要性,虽几无活动经费,但一直在尽力推动。在简述相关工作后,顾维钧报告已新聘“关于远东事务的著名电台专家”佩奇,由其负责联系各地电台安排广播节目,并安排每周在大型报纸发表2篇文章,每月在期刊发表2篇文章,试用期9个月,每月经费2500美元。^⑥9月12日,外交部致电驻美大使馆核准1949年8月至1950年4月每月拨给“特别宣传费”3500美元,其中包括佩奇的薪酬,意即同意雇用。^⑦

可见,顾维钧事先没有报告外交部,就“自作主张”雇用了佩奇。顾维钧为何会于7月最终做出这一决定?顾毓瑞和陈之迈(尤其是前者)的推荐固然是重要因素,但更主要的原因应是对美宣

① “Paign to Ku,” June 9, 1949, *Wellington Koo Papers*, 0180-002-0005-001, 0180-002-0005-002, 0180-002-0005-003.

② “Ku to Koo,” June 10, 1949, *Wellington Koo Papers*, 0180-002-0175-001.

③ “Chen to Koo,” June 20, 1949, *Wellington Koo Papers*, 0180-002-0052-001.

④ 《顾维钧日记》(1949年7月15日), *Wellington Koo Papers*, 0217-003-0001-192。顾维钧的日记通常粘贴有当天的约见时间表,15日约见共5项,与佩奇的见面约在下午5:30。顾维钧在日记正文中记录了与其他访客的谈话内容,唯独缺少与佩奇见面的任何记载。但基本可以确定顾维钧按约定接见了佩奇,因为翻检其日记不难发现,如果当天约见的安排有变,顾维钧会对所粘贴的时间表进行修改。15日当天的时间表就经过了修改,增加了一位访客,但接见佩奇一项并无任何改动。台北“国史馆”所藏相关档案也显示,佩奇的聘期从1949年7月15日开始。参见陈冠任《1950年代国民党当局对美宣传策略的形成与转变》,第277页。

⑤ “Yeh to Koo,” July 19, 1949, *Wellington Koo Papers*, 0163-14-0069-001.

⑥ “Koo to Yeh,” July 26, 1949, *Wellington Koo Papers*, 0163-14-0071-001.

⑦ 《重庆外交部致驻美大使馆电》(1949年9月12日), *Wellington Koo Papers*, 0163-14-0054-001.

传新形势的需要。6月下旬,顾维钧致电外交部,报告美国政府准备发表《美中关系白皮书》的情况。该白皮书旨在为美国对华政策辩护,故将国民党的失败完全归因于其自身存在的问题。鉴于其发表将对国民党当局“深为不利”,外交部命顾维钧“相机劝阻”。7月初,顾维钧两度与美国国务院官员交涉,但并无效果。^①在此情势下,外交部和顾维钧似乎不约而同地将目光转向美国的媒体界,计划利用大众媒体加强对美国社会的宣传,反驳《美中关系白皮书》对国民党的揭露和批评,制造有利于继续争取美援的舆论。史料显示,6月国民党当局已有设立一个新的对美宣传机构“中国之声”(Voice of China)的计划,其中就包括在美国雇用公关代理人,由其通过报纸、电台和论坛等媒介开展宣传工作。^②7月19日叶公超致顾维钧的电报更明白地显示出国民党当局通过大众媒体加强对美宣传的意图。顾维钧雇用佩奇正与外交部的方针“不谋而合”。

或许是考虑到当时美国对华政策已深深卷入内部政争,而且美国民众普遍反感政治宣传,为避免给“大使馆”招致非议,顾毓瑞原拟请由亲蒋的美国商人麦基(Fred Mckee)主导成立、以敦促美国援助国民党当局为目的的中国应急委员会(China Emergency Committee)出面雇用佩奇,但因麦基已有终止该组织活动之打算而未果。最终,佩奇由国民党在美国的官方新闻机构中华新闻社(Chinese News Service)聘为“新闻顾问”(Press Consultant),实际上直接向“驻美大使馆”负责。^③

三、佩奇的媒体公关及其效果

作为中华新闻社的“新闻顾问”,佩奇名义上的职责是向美国的报纸、杂志和电台评论员提供有关中国的信息和观点。^④顾维钧雇用他的目的当然不止于此,也不止于其致叶公超电中所言的工作任务,而是希望利用其关系网络和公关能力,为国民党争取美国媒体界的同情和支持,进而通过舆论力量影响国会立法和政府决策。1950年3月佩奇试聘期满后,在顾维钧的强烈建议下,已撤至台湾的国民党当局又数度续聘,直至1953年底。在长达4年半的受雇时间里,佩奇以记者身份,为争取美国媒体对国民党当局的支持而四处奔走、多方联络。除了与媒体界人士的交流、合作外,他也应邀在一些公开场合发表演说,有时还参加地方名流的小型聚会,利用各种机会开展有利于国民党当局的宣传。因此,佩奇的活动实际上超出了媒体界的范围,顾维钧称其为“宣传专员”,似更名实相符。

由于佩奇受雇时间长,活动范围广,且多数活动系私下进行,相关资料零散而稀少。所幸《顾维钧文件》中保存有11份佩奇的工作报告,其中1950年6份,1951年3份,1952年和1953年各1份。这些报告名义上呈交中华新闻社,实则是提交“驻美大使馆”的。虽然佩奇实际提交的报告应不止此数,但11份报告内容的时间范围基本跨越了其全部聘期,对之进行梳理分析,可对佩奇的具体活动有一个大体了解。

佩奇对美国媒体开展公关活动的主要方式之一是在全美各地尤其是媒体中心城市进行工作旅行,与有影响力的媒体界人士进行当面交流。受雇期间,他前后至少完成了6次长途旅行(见表1)。此外,为了更有效地开展说服和宣传工作,佩奇还请“驻美大使馆”安排其在1950年12月赴台湾进行了为期一个多月的访问。不作长途旅行的时候,佩奇主要在华盛顿和纽约两地活动。

^① 参见金光耀《以公理争强权:顾维钧传》,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2年版,第537页。

^② “Proposed Organization—Voice of China,” *Wellington Koo Papers*, 0163-14-0076-001.

^③ “Ku to Koo,” May 25, 1949, *Wellington Koo Papers*, 0180-002-0179-001; “Memorandum: Employment of Mr. Norma Paige,” September 25, 1952, *Wellington Koo Papers*, 0163-14-0038-002.

^④ “Chen to Koo,” September 16, 1949, *Wellington Koo Papers*, 0158-Q21-0050-002.

表1 佩奇受雇期间历次长途旅行的时间和地点

1949年夏	具体不详(据佩奇称,1949年12月15日至1950年3月10日的旅行旨在“全面追踪”1949年夏季旅行期间与各地媒体所建立的联系,以确定效果,故两次旅行所经城市应大致相同)
1949年12月15日至1950年3月10日	圣路易斯、达拉斯、沃斯堡、休斯敦、菲尼克斯、图森、丹佛、洛杉矶、旧金山、波特兰、塔科马、西雅图、斯波坎(有些城市不止前往一次,大部分时间在加州活动)
1951年3月上、中旬,为期两周	芝加哥、旧金山、西雅图、塔科马、波特兰、洛杉矶、堪萨斯城(再回到芝加哥)、纽约
1951年5月1日至5月12日	路易斯维尔、肯塔基、新英格兰
1951年9月至1952年1月	美国整个太平洋沿岸,南方各州,中西部重要城市
1953年3月至6月	32个州,具体不详

资料来源:“Paige to Chinese News Service,” March 14, 1950, *Wellington Koo Papers*, 0163-14-0070-001; “Paige to Chinese News Service,” March 17, 1951, *Wellington Koo Papers*, 0163-14-0059-002; “Paige to Chinese News Service,” May 15, 1951, *Wellington Koo Papers*, 0163-14-0058-001; “Paige to Chinese News Service,” January 29, 1952, *Wellington Koo Papers*, 0163-14-0040-001; 《“驻美大使馆”节略:关于美籍宣传专员续订合同事》(1953年9月26日), *Wellington Koo Papers*, 0163-14-0029-001。

通过周游各地,佩奇得以与许多报纸、电台、杂志、影视等媒体的负责人和著名作家、播音员等进行当面交流,探讨远东问题,阐述国民党当局的立场以及台湾地位与“自由世界前途相关之切要”。^① 通过强调远东事务的重要性、渲染中共夺取政权对美国的安全威胁和批评美国的对华政策,佩奇力图说服媒体界人士采取同情国民党、支持美国继续给予援助的立场,制作或刊发有利于国民党当局的栏目、报道和节目。最初,由于国民党在美国的大力援助下仍不断溃败,最终撤守台湾,美国朝野批评之声甚多,佩奇的公关活动遇到一些困难。但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舆论环境大变,佩奇的活动得以更顺利地展开,影响日益扩大。

报纸是当时最重要的大众媒介,报界自然成为佩奇公关工作的首要对象。佩奇自称在1949年夏季的旅行期间,实地访问了50多家报纸,后将其中40家列为构建国民党当局新闻传播渠道的基础,这些报纸每日读者人数超过5000万。数份西部的大型报纸原本对国民党当局持明显的批评立场,经佩奇与报纸发行人或总编接触交流之后,大多都转为同情态度,其中《旧金山纪事报》(*San Francisco Chronicle*)的发行人史密斯(Paul Smith)转变尤为彻底,其支持国民党的思想甚至比此前批评的思想更加强烈。但仍有个别重要报纸拒绝改变立场,还有许多报纸则态度模棱,对佩奇的接触反应冷淡。受到朝鲜战争的刺激,美国报界对远东问题的关注度大增,“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希望刊登来自或关于台湾、国民党的消息和有关红色中国的实际情况”。据佩奇称,至1950年10月,可作为国民党当局新闻传播渠道的报纸已增至156家,覆盖750万至1亿读者。^② 1951年5月,在顾维钧的建议下,佩奇访问南方一些州和新英格兰地区。^③ 通过与波士顿、哈特福德、纽黑文等地15家报纸主编的深入交流,佩奇自认为改善了新英格兰地区媒体对蒋介石和台湾当局普遍持批评态度的状况,也促使一些报纸改变了欧洲优先、忽视远东的观点。据称,许多编辑承认此前被误导了,转而认为美国对国民党的失败负有直接责任,应增加对台援助。^④

电台是另一受众极广的媒体,从事电台工作多年的佩奇自然重视对电台界的联络和公关。早

① 《“驻美大使馆”节略:关于美籍宣传专员续订合同事》(1953年9月26日), *Wellington Koo Papers*, 0163-14-0029-001。

② “Paige to Chinese News Service,” March 14, 1950, *Wellington Koo Papers*, 0163-14-0070-006; “Paige to Chinese News Service,” October 24, 1950, *Wellington Koo Papers*, 0163-14-0063-002, 0163-14-0063-003。

③ “Koo to Yeh,” July 23, 1951, *Wellington Koo Papers*, 0163-14-0055-001。

④ “Paige to Chinese News Service,” May 15, 1951, *Wellington Koo Papers*, 0163-14-0058-003。

在1949年8月,刚刚被试聘的佩奇就建议相互广播公司(Mutual Broadcasting Company)制作了一期关于美国对华政策的谈话节目,两位嘉宾中的一位是主张继续援助国民党当局的参议员诺兰(William Knowland),另一位是主张承认新中国的参议员泰勒(Glen Taylor),据说诺兰在辩论中明显占据了上风。^①此后,佩奇在旅行中访问各地电台,组织了多场圆桌交流和讨论节目,并经常与电台管理者和记者们探讨报道方针问题。据说,经过他的联络,多数电台都对国民党当局表示同情,将有利于国民党的报道置于有关中国新闻的头条,但也有个别重要电台如全国广播公司(NBC)最初拒绝合作。佩奇承认,影响电台对中国新闻的处理要比影响报纸的新闻报道更困难一些,他自称通过向著名的评论员提供“准确的资料”,成功使其中一些人意识到中国问题极端重要,必须给予优先的关注。^②朝鲜战争爆发后,电台播送有关亚洲事务的报道日益增多,但内容严重依赖通讯社新闻,缺乏深度报道,使佩奇颇感失望。他与许多电台评论员保持频繁联系,在组织圆桌、对话、辩论等专题广播节目方面做了大量工作。^③1950年10月,佩奇在纽约与全国广播公司“与媒体见面”(Meet The Press)节目的制作人商定制作一期访谈,对象为力主援助台湾的美国海军中将巴杰(Oscar C. Badger);美国广播公司在佩奇的推动下决定在台湾派任一位通讯员,增加与台湾直接相关的播报节目,而且有兴趣拍摄系列电视节目,邀请远东官员(特别是大使和联合国官员)讨论时政问题,始终将台湾作为话题之一;此外,佩奇也加强了与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和一些重要节目制作人的联系。^④

与报纸和电台相比,佩奇对杂志和电影界的公关活动成绩较为逊色。在1950年10月24日的工作报告中,佩奇称与杂志的联络虽取得了一些成功,但总体上不如预期,“令人失望”。朝鲜战争爆发后,虽然一般杂志的态度有所变化,但刊载的有分量的文章还是不多。^⑤1951年7月21日,《科里尔》(Collier's)周刊发表关于国民党在大陆游击活动的头版文章,佩奇当天即专门向“驻美大使馆”报告,称文章作者沙普伦(Bob Shaplen)正是在其劝说下访问了台湾,然后撰写了此文。^⑥如此急于表功,恰恰反映出其对杂志界的公关活动成效无多。佩奇推动美国电影界拍摄亲国民党影片的努力更是劳而无功。早在试聘期间,他就花大量时间与好莱坞电影界进行沟通,虽然各公司制片人私下都同意援助国民党,但如何制作一部既支持国民党又卖座的电影却是个难题。佩奇建议美高梅公司派人赴台湾拍摄纪录片或新闻片,皆未果;后又试图推动派拉蒙公司拍摄关于台湾的新闻短片,也因预算问题而搁浅。1951年3月,他再次尝试劝说哥伦比亚影片公司拍摄一部故事片,并推荐了蒋介石反共历程和陈纳德故事两个题材,但最终仍不了了之。^⑦

佩奇对著名专栏作家的公关活动也难称成功。一些作家与其交流后,承诺撰写支持国民党当局的文章,有时有立竿见影的效果,但许多时候结果并不如人意。佩奇抱怨称,有的作者因未能善用而使素材失去了价值,而有的作者甚至一字不差地照抄他提供的材料,应付了事。^⑧

① “Ku to Koo,” August 16, 1949, *Wellington Koo Papers*, 0180-002-0174-001, 0180-002-0174-002.

② “Paige to Chinese News Service,” March 14, 1950, *Wellington Koo Papers*, 0163-14-0070-002, 0163-14-0070-003, 0163-14-0070-007.

③ “Paige to Chinese News Service,” October 24, 1950, *Wellington Koo Papers*, 0163-14-0063-003, 0163-14-0063-004.

④ “Paige to Chinese News Service,” October 23, 1950, *Wellington Koo Papers*, 0163-14-0064-001, 0163-14-0064-002.

⑤ “Paige to Chinese News Service,” October 24, 1950, *Wellington Koo Papers*, 0163-14-0063-004.

⑥ “Paige to Chinese News Service,” July 21, 1951, *Wellington Koo Papers*, 0163-14-0057-001.

⑦ “Paige to Chinese News Service,” March 14, 1950, *Wellington Koo Papers*, 0163-14-0070-003, 0163-14-0070-004. “Paige to Chinese News Service,” October 24, 1950, *Wellington Koo Papers*, 0163-14-0063-005; “Paige to Chinese News Service,” March 17, 1951, *Wellington Koo Papers*, 0163-14-0059-006.

⑧ “Paige to Chinese News Service,” October 24, 1950, *Wellington Koo Papers*, 0163-14-0063-002, 0163-14-0063-003.

在各地旅行的过程中,佩奇经常被邀请作关于远东和中国问题的演讲。尤其是他1951年初访台归国后,更受各界欢迎,演讲邀约愈多,甚至曾在五角大楼为美军情报部门开讲。是年3月在旧金山的一场演讲结束后,提问环节长达4个多小时,问题大多集中于美国市民能为援助国民党当局做什么。佩奇称自己的讲述使听众相信台湾已做好战斗的充分准备,但需要美国的道义和物资援助。他在旧金山还曾担任一档电视节目的嘉宾,据称节目播出后收到空前的观众来信和电话,本地所有电视台和3家广播电台都向他发出了参加节目的邀请。此外,佩奇受邀参加了不少各地政商精英的小型聚会,利用私人交流的机会为国民党当局进行游说和宣传。^①

值得一提的还有,佩奇的工作报告中许多关于美国各地舆情以及民众感兴趣问题的记录,对于国民党当局具有一定的情报价值。1953年,他还编写有关中国的39个问题,对300余家报纸展开问卷调查。据称,调查结果显示:第一,所谓美国民意反对台湾当局的说法“并无依据”;第二,美国主流民意“推崇”蒋介石并支持台湾当局“抗共及自力更生之努力”。顾维钧认为,这一调查结果“甚足为我方对外之助”,据说有报纸主笔曾将之抄送国务卿杜勒斯。^②

当然,佩奇的主要工作对象仍是媒体。他周游全国,广访业内人士,并将“驻美大使馆”提供的新闻报道素材源源不断地输送给各地报纸、电台和杂志。1950年10月,受雇仅15个月的佩奇就自称已旅行超10万英里,与数千人进行交谈,寄出数百封私人书信,此外尚有大量打印或油印邮件,并亲自撰写了若干社论文章。^③1953年8月15日至11月15日,他通过多种方式与各地报纸编辑联系235人次,呼吁他们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联合国。^④

佩奇在工作报告中屡次声称,由其执行的对美国媒体界的公关活动总体上是成功的,应当继续进行,以期取得更好的效果。试图对佩奇活动的效果做出恰如其分的评估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这一时期美国媒体有关中国的舆论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尤其是朝鲜战争),而佩奇对自己工作成绩的陈述也难免有夸大之处。而且,佩奇公关活动的成效也受到经费和人员的限制。他在1950年10月的一份报告中称,国民党当局提供的经费对个人开展活动而言已属充裕,但不足以支持一场广泛覆盖的宣传运动;他的常聘秘书只有1人,希望增加助手,但需要增拨经费。^⑤然而,国民党当局提供的经费此后不仅没有增加,1952年起还削减了20%。

但可以肯定的是,佩奇长达4年半的媒体公关活动收到了一定的实际效果,进而影响了这一时期美国社会的对华舆论。在工作报告中,佩奇经常称自己说服媒体界人士改变了原有的“错误”立场和观点,但很少具体描述交谈过程,1951年5月11日与《哈特福德新闻报》(*Hartford Courant*)总编布鲁克(Herbert Brucker)谈话的记述虽仍简略,但已相对具体,从中或可管窥其公关效果。交谈之初,布鲁克认为美国已然失去了整个东方,应全力援助欧洲,因为那里将决定世界的未来,因此他完全赞成美国政府的欧洲优先政策。布氏不相信台湾存在任何有战斗力的军队,并谈到国民党当局从大陆撤退时丢弃物资和官员腐败等问题,他相信中共的事业更有益于普通中国人,而台湾对美国没有任何特殊价值,继续给予援助只会导致美军直接卷入中国内战。佩奇称,经过长时间的讨

① “Paige to Chinese News Service,” March 17, 1951, *Wellington Koo Papers*, 0163-14-0059-003, 0163-14-0059-004.

② 《“驻美大使馆”节略:关于美籍宣传专员续订合同事》(1953年9月26日), *Wellington Koo Papers*, 0163-14-0029-001、0163-14-0029-002。

③ “Paige to Chinese News Service,” October 24, 1950, *Wellington Koo Papers*, 0163-14-0063-001.

④ “Paige to Chinese News Service,” November 16, 1953, *Wellington Koo Papers*, 0163-14-0025-002.

⑤ “Paige to Chinese News Service,” October 24, 1950, *Wellington Koo Papers*, 0163-14-0063-007. 一则史料称佩奇曾创办一家公关公司,作为菲律宾和台湾当局在美国的代理人。“Broadcast Japanese Surrender; Norman Paige,” *The Washington Post*, March 8, 1976, p. C4. 但佩奇在工作报告中没有提及此事,亦无其他史料可资佐证,似不可信。

论,他相信自己直接纠正了布鲁克“所有主要的错误看法”,谈话结束时,布氏称自己有必要尽快找机会去亚洲旅行,迫切希望佩奇把“所有信息和材料”寄给他并经常通信,最后还言道:“我们整个东部各州需要更多像你这样的人来告诉我们事实而非宣传……今天的讨论使我觉得,我们不是得到了太多错误信息,而是缺乏足够的真实信息……我们此前发表的东西是不对的。”^①

报纸总编政治立场的改变,往往导致该报内容政治倾向的调整,进而影响读者的认识和思想。在此意义上,佩奇的媒体公关间接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社会和政治影响。当然,佩奇为国民党当局公关宣传的“成绩”,在相当程度上是因为冷战初期美国作为世界资本主义阵营的头号国家,其社会本身就有深厚的反共思想土壤,冷战思维弥漫,故各界人士普遍更易于接受那些导向美国政府应继续援助台湾当局以阻止共产主义扩张这一结论的所谓“事实”和论说。但佩奇的活动无疑进一步助推了美国社会反共思想和冷战思维的蔓延与强化,在形塑这一时期美国各界对于中国问题的认知和对美国政府应采取何种对华政策的立场方面,更是发挥了不容小觑的作用。

四、解雇佩奇之原委

对于佩奇的工作,顾维钧相当满意,台湾当局一度也颇为支持。由于“驻美大使馆”宣传经费紧张,1950年3月佩奇试聘期满前夕,顾维钧曾尝试请在美国的宋美龄出资继续雇用,但遭拒绝。^②顾维钧遂致电“外交部长”叶公超,后者同意续聘佩奇9个月,并拨给宣传经费,先期拨付1万元。^③此后“驻美大使馆”迟迟没有收到其余经费,只得设法垫付佩奇的薪酬和开支。顾维钧9月致电叶公超催拨经费未果,10月在电报中询问“如款实有困难,应否转商解约停止”。叶复电称日内汇款,意即不必解约,并于12月同意继续雇用一年,可见对佩奇工作之肯定。^④

然而,1951年6月美国一些国会议员发起调查“中国游说团”(China Lobby,即通常所谓“院外援华集团”)问题,《国会季刊》(Congress Quarterly)为此发表专刊并公布国民党在美“代理人”名单,致使台湾当局在美形象和宣传工作受到巨大打击。尽管佩奇并不在名单之内——可见其在公关活动中隐藏了自己与国民党当局的雇佣关系——但叶公超还是于8月致电顾维钧,称“外汇短绌,又值所谓游说问题甚嚣尘上”,为避免贻人口实,拟立即解聘佩奇。经顾维钧复电力争,并表示次年可削减四分之一的宣传经费,叶公超同意不解雇并再续聘一年。^⑤1952年,经顾维钧强烈建议并专门呈送备忘录,“外交部”允再续聘一年。1953年,虽然顾维钧仍极力争取,但经台湾当局“有关机关会商”,最终决定次年不再续聘。^⑥

顾维钧之所以不顾“外交部”的消极态度而一再力主续聘,主要是出于对佩奇工作的高度认可,而这种认可又包括三个方面。首先,顾维钧认为佩奇的工作是对美宣传的切实需要。如前所述,顾维钧最初雇用佩奇主要就是为了在美国政府发表《美中关系白皮书》后加强对美宣传,为台湾当局继续争取美援营造有利的舆论环境。尽管随着1950年朝鲜战争的爆发以及中国人民志愿

① “Paige to Chinese News Service,” May 15, 1951, *Wellington Koo Papers*, 0163-14-0058-005、0163-14-0058-006.

②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译:《顾维钧回忆录》第7分册,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536页。

③ “Yeh to Koo,” March 31, 1949, *Wellington Koo Papers*, 0163-14-0052-001.

④ 《顾维钧致“外交部”电稿》(1950年9月20日),*Wellington Koo Papers*, 0163-14-0051-001;《顾维钧致“外交部”电》(1950年10月16日),*Wellington Koo Papers*, 0163-14-0050-001;《“外交部”致顾维钧电》(1950年10月21日),*Wellington Koo Papers*, 0163-14-0049-001;《叶公超致顾维钧电》(1950年12月7日),*Wellington Koo Papers*, 0163-14-0044-001.

⑤ 《叶公超致顾维钧电》(1951年8月6日),*Wellington Koo Papers*, 0163-14-0043-001;《顾维钧致叶公超电》(1951年8月7日),*Wellington Koo Papers*, 0163-14-0042-001;《叶公超致顾维钧电》1951年8月20日,*Wellington Koo Papers*, 0163-14-0041-001.

⑥ 《叶公超致顾维钧电》(1953年12月19日),*Wellington Koo Papers*, 0163-14-0021-001.

军的参战,美国开始采取“遏制”和“孤立”新中国的政策,重新向国民党提供大量的军事和经济援助,但顾维钧认为,在迅疾演变的国际局势之中,台湾当局在诸如联合国席位等许多国际政治问题上依然“前途莫测”,“美国民意向背至足重视”,对美宣传工作不可松懈。^①然而,1949年起国民党逐渐裁撤了中华新闻社在旧金山、芝加哥和华盛顿的办事处,只保留了在纽约的总部,对美宣传力量明显削弱。至1952年,佩奇已成为该社在纽约之外唯一的联络员。顾维钧还指出,作为一个从事媒体工作多年的美国人,佩奇比国民党人更了解美国社会,能协助后者以最有效的方式向美国民众阐述观点。^②因此,为了满足对美宣传的迫切需要,顾维钧认为佩奇之工作“实不可辍”。^③

其次,佩奇的工作方式与顾维钧的对外宣传思想十分契合。作为一个资深的外交家,顾维钧高度重视对外宣传。与许多国民党高层人士仅看重对外国政界人士和社会名流的游说活动不同,顾维钧在积极游说外国上层人士的同时,非常注意联络大众媒体,对美宣传尤其如此,因为他认为“美国外交政策,悉赖民意而后盾”^④,而媒体可以极有力地影响民意。1946年赴美就任大使前夕,顾维钧晋见蒋介石,后者谈到对美宣传工作之重要并指示其联络教会组织,顾在说明对教育界和商界宣传的重要性之余,着重阐述了对报纸和广播电台应开展的工作。^⑤这是他后来雇用佩奇对美国媒体开展公关活动的思想基础。在顾维钧看来,佩奇的媒体公关工作是比较理想的对外宣传方式。他认为,直接向美国新闻媒体提供由中国人所撰文章和小册子的传统方式很难取得良好效果,有时甚至会引来媒体界的反感,更有效的方式是通过与美国媒体界人士见面沟通,取得对方的信任,由他们主动作有利于国民党的宣传,才能更易被美国民众所接受。^⑥佩奇奔走美国各地,与媒体界重要人士当面交流,正符合这种思想。1950年4月佩奇首次续聘后,顾维钧接见他并面授机宜。此时国民党当局已败退台湾,他一方面指示佩奇侧重宣传“有关(国民党)军队士气的提高、政局的好转、大陆人民在共产党统治下的不满情绪、中共政权的苏俄背景等方面的真实情况”,另一方面建议其在与媒体界人士的交流过程中,不要一味力图说服他们撰写有利于国民党当局的社论文章,更应该尝试用“事实”和数据资料去“教育”他们,“引导人们得到有利于我们事业的结论”。^⑦在此后的公关活动中,佩奇基本遵循了这一指示。

再次,顾维钧对佩奇的工作表现也十分肯定,认为“卓著成效”。^⑧1952年“驻美大使馆”的一份备忘录称,虽然佩奇对杂志和电台评论员的公关工作没有达到预期效果,但已建立并维持了一个遍及全美的联系网络。而且,佩奇将大部分时间用于在美国东部沿海以外的地区进行旅行,影响了中部和西部的对华舆论,尤具价值。顾维钧称其“工作所及地区广阔,深入民间,得一般民众对我增加了解,甚关重要”。同时,顾维钧对佩奇“诚实”“谨慎”“认真遵循指示”的工作态度、“低调”“谦逊”的性格和对国民党当局高度忠诚的立场也十分欣赏。^⑨

① 《顾维钧致叶公超电》(1951年8月7日), *Wellington Koo Papers*, 0163-14-0042-001;《顾维钧致“外交部”函稿》(1952年10月), *Wellington Koo Papers*, 0163-14-0034-002。

② “Memorandum: Employment of Mr. Norman Paige,” September 25, 1952, *Wellington Koo Papers*, 0163-14-0035-002.

③ 《顾维钧致“外交部”函稿》(1952年10月), *Wellington Koo Papers*, 0163-14-0034-002。

④ 《“驻美大使馆”节略:关于美籍宣传员续订合同事》(1953年9月), *Wellington Koo Papers*, 0163-14-0029-002。

⑤ 《顾维钧回忆录》第5分册,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725—726页。

⑥ 《顾维钧回忆录》第5分册,第726页;金光耀:《国民党在美国的游说活动——以顾维钧为中心的讨论》,《历史研究》2000年第4期,第62页。

⑦ 《顾维钧日记》(1950年4月4日), *Wellington Koo Papers*, 0217-004-0001-235;《顾维钧回忆录》第7分册,第727页。

⑧ 《顾维钧致“外交部”函稿》(1952年10月), *Wellington Koo Papers*, 0163-14-0034-001。

⑨ “Memorandum: Employment of Mr. Norman Paige,” September 25, 1952, *Wellington Koo Papers*, 0163-14-0038-003;《顾维钧致“外交部”函稿》(1952年10月), *Wellington Koo Papers*, 0163-14-0034-001、0163-14-0034-002。

此外,促使顾维钧主张续聘佩奇的可能还有两个因素。一是顾维钧认为佩奇“向专心于联络报界及广播方面重要人物……对美国会及政界从无接触,应不至涉及所谓游说之嫌”,并称佩奇之雇用在美国完全合法且常见,而佩奇也已按照美国法律在“相关机构”进行了登记,可保无虞。^①二是顾维钧认为雇用佩奇的费用远远低于许多小国在美宣传经费,“似不为多”,按佩奇工作的“以往成效,衡量得失,此项宣传似不可废”。^②

然而,台湾当局最终还是于1953年底决定不再续聘佩奇。究其原因,“外交部长”叶公超反复强调的“外汇短绌”固然是一方面,但更直接的缘由是这一时期台湾当局对美宣传方略的调整。

朝鲜战争期间,美国政府的对台政策发生明显转变,全面加强了对国民党当局的军事和经济援助,后者得以在台湾日益站稳脚跟。^③1953年,台美关系在朝鲜战争停战和冷战格局深化的背景下显著调整。美国将台湾岛视为遏制共产主义的前沿,强化美台军事合作。同时,美国对台提供大规模经济援助,并利用外交手段确保台湾当局的影响力与生存空间。总体看,1953年的台美关系呈现军事保障增强、经济援助扩大、政治支持稳固的趋势,这令国民党当局判断美国态度已定、美援将会持续,对美宣传游说工作的重要性随之降低。

在此背景下,台湾当局开始考虑调整对美宣传方略。1952年叶公超赴美参加第7届联合国大会期间发现美国各界人士都“极关切”台湾局势,乃于返台后“拟具对美宣传说帖”,送呈“总统”蒋介石和“行政院长”陈诚参考,陈诚命其与相关部门负责人研究具体办法。1953年初,相关部门负责人经会商作出若干决议。其中,针对一些在美的国民党政要“自动从事宣传工作”而导致令出多门的现象,“为免自乱步调,致产生相反作用”,决议对美宣传工作须“统一步调”,请“顾大使就近多负责任,常与联络”,意即由顾维钧统筹协调对美宣传工作。^④这无疑是对此前顾维钧外宣工作的肯定,其中亦当包括对其雇用佩奇进行媒体公关所取得成绩的认可。

除了力图统一对美宣传的步调外,台湾当局也尝试对经费运用和外宣方法进行调整。1953年底,“外交部”重新检讨对美宣传策略,认为雇用佩奇所费不赀,如将之转而用于邀请外国记者访问台湾地区,使他们返国后可以利用实地见闻在媒体上作有利于台湾当局的宣传,则可取得更好的效果。这一提议随即获得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的批准,佩奇之解聘遂成定局。^⑤因此,台湾当局停止雇用佩奇并非因为对其工作的否定,而是调整对美宣传方略的结果。对佩奇的聘用虽于1953年底结束,却开创了台湾当局此后雇用美国代理人对美媒体界开展公关活动的先河。^⑥

五、结语

顾维钧雇用佩奇对美国媒体展开公关活动,是国民党当局面对在大陆的统治即将倾覆、美国政府准备从中国事务中“脱身”之际加强对美宣传的一种新策略。顾毓瑞的提议和积极推动无疑是

① 《顾维钧致叶公超电》(1951年8月7日), *Wellington Koo Papers*, 0163 - I4 - 0042 - 001; “Memorandum: Employment of Mr. Norman Paige,” September 25, 1952, *Wellington Koo Papers*, 0163 - I4 - 0038 - 001。

② 《“驻美大使馆”节略:关于美籍宣传员续订合同事》(1953年9月), *Wellington Koo Papers*, 0163 - I4 - 0029 - 002。

③ 参见杜继东《美国对台湾地区援助研究(1950—1965)》,凤凰出版社2011年版,第60—61、90—93页。

④ 《叶公超致顾维钧函》(1954年2月20日), *Wellington Koo Papers*, 0169 - I21 - 0130 - 001、0169 - I21 - 0130 - 002。

⑤ 陈冠任:《1950年代国民党当局对美宣传策略的形成与转变》,第278页;赖韦廷:《中华民国对外文化冷战:以外交部对美宣传为中心,1949—1985》,第15页。

⑥ 1957年10月,台湾当局雇用专业的公关公司莱特公司(Hamilton Wright Organization)在美从事宣传活动,其主要工作除了安排美国记者访台外,就是与美国媒体建立联系,然后将该公司制作的电视片、影片和图文报告交由媒体播放和刊载。参见陈冠任《1950—60年代“中华民国”对美宣传政策的转型》,台北《政大史粹》第27期,2014年12月,第98—100页。

重要因素,而美国政府发表《美中关系白皮书》的计划则是促使顾维钧决定雇用佩奇的直接原因。基于对美宣传的需要、其本人的外宣思想以及佩奇的实际表现,顾维钧高度肯定佩奇工作的价值、方式和效果,一再力主续聘,并得到台湾当局的支持。1953 年底台湾当局最终决定不再续聘,并非不认可顾维钧和佩奇的工作,而是立足渐稳后全面调整对美宣传工作方略的结果。

虽然很难准确评估其效果,但佩奇对美国媒体界长达 4 年半、足迹几乎遍及全国的公关活动,使许多媒体调整或转变了对国民党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营造了有利于台湾当局继续争取美援的舆论环境。其间,佩奇极力渲染国民党失守台湾将对美国造成的巨大“威胁”,持续向媒体提供各种抹黑新中国、有利于台湾当局形象的所谓“事实”。这些观点和素材经过大众媒体的传播,助推了反共思想和冷战思维在美国社会的蔓延与强化,参与了这一时期美国各界对于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认知的形塑,对中美关系产生了十分深远的负面影响。

(责任编辑:冯 琳)

A Study of Wellington Koo's Employment of Norman Paige for Media Public Relations in the United States during the Early Cold War

Wei Bingbing

Abstract: In July 1949, Wellington Koo, ambassador of the Kuomintang authorities to the United States, employed radio reporter Norman Paige to engage with the U. S. media. This was prompted by Gu Yurui, secretary of the embassy, but Koo finally made the decision because of the “China White Paper” soon to be issued by the U. S. government. It attributed the Kuomintang's defeat to its internal problems, which was extremely unfavorable to the Kuomintang. During his employment, Paige traveled across the United States and put in a great deal of effort in making contact and engaging with the media with the aim of arousing public sympathy from the media for the Kuomintang and changing public opinion so as to enable the Taiwan authorities to continue seeking assistance from the United States. Koo highly appreciated Paige's work and repeatedly advocated renewing his contract. The contract was not terminated until the end of 1953 when the Taiwan authorities adjusted their public relations strategy towards the United States. Paige's engagement with the U. S. media encouraged the spread of anti-communist ideas and Cold War thinking in the U. S. society, affected the U. S. public perception of the Chinese mainland and Taiwan region during the early Cold War, and exerted a profound negative impact on Sino-U. S. relations.

Key Words: the Early Cold War, Wellington Koo, Norman Paige, Gu Yurui, U. S. media